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AN Jin YUAN Bei XIAO Youli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October 10, 2021

Accepted: March 3, 2022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 Jin, YUAN Bei & XIAO Youliang. (2022).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117–12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4](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4>

Abstract: Studying the image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helpful to reflect and tell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rough comb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 involve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s, history, communication and linguistics, and discuss the ima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two aspects of self-shaping and others-shaping.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song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friends, mainstream foreign newspapers and the US military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CPC. Foreign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macro to micro perspective.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tre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es is promising.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we can try to use big data and statistics method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erms of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The image of CPC; Image research; overview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YAN Jin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Literature, and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National Im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YUAN Bei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e is a student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he National Im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XIAO You Liang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 is a student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National Im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回顧與展望

閻瑾 袁貝 肖有亮

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有助於講述和反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故事，通過梳理發現，已有的國內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學、歷史學、傳播學和語言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從自塑和他塑兩個面向來探討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和傳播，關注報刊、歌曲、紀念活動、國際友人、國外主流報刊、美軍觀察組等對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的影響。國外研究則因時代背景的不同歷經了三個發展階段，研究取向也從宏觀逐漸走向微觀。就未來的研究趨勢而言，在研究視角上，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大有可為；在研究方法上，可嘗試運用大資料、統計學的方法，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開展大資料實證調查研究；在研究使用的材料上，他者材料的運用有待進一步挖掘。

關鍵詞：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研究綜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選擇日趨多樣化、主觀化的當今，形象之於個體及組織的價值魅力凸顯，構成人們對個體或組織進行評價、選擇的重要依據。而政黨形象指政黨的屬性、政黨符號、黨員隊伍及政治參與能力給黨內外公眾留下的相對穩定的綜合感知和整體印象^①。在現代政治體系中，政黨作為最有效的政治組織，其形象問題日益受到多方關注。良好的政黨形象不但能影響人民對黨的認可與支援，還可以提升黨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是展現政黨號召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以下也簡稱「中共」）在抗戰時期構建了富有生命力的政黨形象。從國內來說，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戰場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國人面前樹立了一個團結、抗日、民主的先進善治政黨形象。從國際來看，中國共產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和認可。對國內外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壯大的多維面向，管窺中國革命成功的要訣，一定程度上也可為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形象塑造與傳播提供歷史借鑒和啟示，以便在新時代更好地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故事。

一、國內研究述評

1. 領域和視角多樣

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研究一直是國內研究的熱點，涉及多個學科視角。一是政治學框架下的研究。主要論述了在抗戰時期樹立和改善我黨形象的理念、途徑、機制等問題。如王建華梳理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塑造的革命形象，認為是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影響了革命政黨的形象塑造^②。二是傳播學框架下的研究。主要論述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演變、傳播策略、技術路徑等問題，如熊忠輝以傳播學為研究視角，分析了中共如何通過各種力量將自身的良好形象有效地傳播給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③。三是以歷史學為框架的研究，主要探討了抗戰時期我黨形象塑造的經驗、特點和對外傳播思想等問題。如李玲主要討論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的形象構建的方式，認為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對建構黨的形象產生了重要促進作用^④。四是語言學框架下的研究，主要探討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形象構建中



的語言、文本特點和翻譯活動。如廖華英、陳勇通過敘述延安時期語言翻譯的特點，體現了翻譯活動中意識形態的重新構建對中共形象的對內和對外傳播作用^⑤。

從研究的領域來分類，在抗戰期間，可分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控制下的大後方、日偽控制下的淪陷區這三大政治板塊。其中學者對抗戰期間根據地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如李豔全面深入的分析了中共延安時期局部執政形象的構建，梳理了黨加強執政形象構建的關鍵因素^⑥。趙耀宏考量和分析了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執政形象，得出了政黨要塑造良好的執政形象必須要有一套好作風的深刻啟示^⑦。相比之下，大後方的中共形象研究略顯不足。學者洪富忠一直致力於中共在大後方的形象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建構——以大後方為中心的考察》這篇文章重點分析了大後方這一區域在戰時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中共國際形象能夠成功構建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是抗戰中的中堅力量^⑧。《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形象在大後方的塑造及國共博弈》一文則重點論述了中共在大後方所發行的刊物對中共形象的影響，作者認為這些刊物起到的宣傳作用有力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形象^⑨。由於淪陷區中共的資料最為缺乏，目前學界對於中共在淪陷區的形象塑造研究尚未涉及。

2. 自塑與他塑並舉

更多學者根據形象的形成過程，從形象的自塑和他塑兩個面向來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問題。自塑方面，既有關於抗戰期間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也有從不同形象載體切入的微觀局部性研究。在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方面，陳興豔研究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塑造宣傳自身正面形象的策略方法，探討了中共國際形象宣傳的意義和影響^⑩。付華豔論述了抗戰時期黨的形象建設目標及路徑，分析了其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及其對現實帶來的深刻啟示^⑪。史翠芬探討了中共在抗戰時期形象塑造的成功要訣，認為其對當前中共提高自身執政能力、保持好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⑫。以上這幾篇文獻都是從中共形象塑造系統性宏觀研究方面探討了抗戰期間中共對自身良好形象的積極傳播，認為中共在其形象塑造上的作為改善了國際和國內對中共的偏見和誤讀，加強了外界對中共的援助，也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報紙、歌曲、國恥紀念、「七一」紀念、展覽會、國民參政會、晉西北士紳參觀團等等都是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的不同載體，它們都為抗戰時期中共形象的提升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關於報紙的研究頗多，學者研究最集中的是《新華日報》。如劉興旺、林志彬研究了《新華日報》多樣化的報導策略，認為中共在抗戰時期通過《新華日報》在國統區樹立的政黨形象是親民、民主的^⑬。張培星認為《新華日報》作為中共的黨報，在傳播中共的親民形象過程中發揮了舉重若輕的作用^⑭。石瑾則是從歌曲這一文藝視角切入，圍繞《東方紅》的歌詞內容探討延安時期黨群關係的變化，認為中共通過抗戰歌曲進行的宣傳動員樹立了其在民眾心中的形象^⑮。熊斌、周勇研究了民主革命各個時期中共主題一致但內涵不同的國恥紀念活動，認為其有著激發國人救國雪恥的熱情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共政治形象的重要意義^⑯。夏松濤梳理了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開展的多種形式的展覽工作，總結了其產生的深遠意義及對中共形象塑造產生的影響^⑰。國民參政會成立於中國抗戰時期，由各抗日黨派代表和無黨派人士組成，在當時屬於中國國家最高諮詢機關。李向洋、王健華研究了中共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政治話語，發現中共憑借國民參政會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公正廉潔的政黨形象且展示了自我革命的政黨品質^⑱。另外，作為抗戰時期中共的一個重要團結物件，開明鄉紳也是中共努力爭取的「中間力量」，開明鄉紳對延安及根據地的參訪，也對中共良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幫助作用。蘭雨彤圍繞延安時期中共形象塑造的基本內涵，例舉了抗戰時期中共對晉西北士紳這一群體的力爭事實，分析並總結了中共關於塑造自身政黨形象的技術路徑和影響中共形象塑造的諸多因素，總結出一些中共形象塑造的歷史經驗^⑲。



他塑方面,很多學者關注著名國際友人在抗期間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塑造起到的重大作用和突出貢獻,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如盛開放等分析了海倫·斯諾等外國記者在陝北的經歷,認為斯諾夫婦的報導擊碎了外界對中共紅軍的一些不公報導,讓國際國內社會重新客觀公正地認識了中共及在中共領導下的紅軍隊伍^①。胡龍通過闡述三位著名國際友人「三S」在抗戰期間訪問延安並向世界傳遞了中共及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堅決抗戰的公正事實,論述了他們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塑造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貢獻^②。王冬梅研究了抗戰期間外國記者對中共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進行的考察,總結了這些報導對中共形象宣傳產生的影響^③。陳磊研究了抗戰期間訪問根據地外國記者對中共的抗戰報道,認為外國記者當時對中共的抗戰報道細致還原了中共及其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戮力抗戰的真實面貌^④。

外媒對中共形象的塑造也是許多學者頗為關注的一方面。為了滿足美國國家的自身利益和某些戰時目標,外媒對共產黨的宣傳必然帶有傾向性,有些觀點難免片面,但是其中的許多真切見解也讓外界頗為客觀地認識了中共。因此,國外主流報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研究中國共產黨形象的一個視角,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關注。如朱瀟瀟,徐宇以《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兩個美國大報為語料,研究了1930至1937年間這一時間段關於中共的213篇相關報導,探討了他者筆下的中共的形象和成因^⑤。姜怡文以《大美晚報》為語料,研究了太平洋戰爭時期該報對中共進行的報導,發現該報由於立場原因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也不妨礙外界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中共的正確認知^⑥。

另外還有學者以美軍觀察組的視角來考察這一問題。美軍觀察組在戰時因為美國自身利益需要訪問了敵後抗日根據地,與中共進行了有效合作。觀察組的一些真知灼見不僅打破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是抗戰中的一股中堅力量,從而正面影響了外界對中共的看法。如舒文、嚴曼一深入研究了抗戰時期美軍觀察組對中共的認識,認為其認識成果有助於駁斥當今減損甚至全然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及其地位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⑦。彭波分析了美軍觀察組塑造中共抗戰形象的原因和過程,作者認為這一次與美軍觀察組的接觸和合作增進了中國共產黨和世界對彼此的瞭解,讓中國共產黨逐漸走向了國際舞臺^⑧。

二、國外研究綜述

國外學術界很少直接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建設,但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歷史作用有許多研究,在論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用中會涉及到黨的形象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間接研究了抗戰時期黨的形象建設。對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這一主題的探索,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 抗戰時期國外記者的「中共熱」

抗日戰爭時期很多到過陝甘寧邊區的西方記者、作家、學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寫下了大量的作品,這些都是研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原始材料和基礎文本,促成了國外對中共的最早認知。如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⑨、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中國的戰歌》^⑩、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記》^⑪、美聯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岡瑟·斯坦因(Stein Gunther)的《紅色中國的挑戰》^⑫、《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⑬以及外國記者發表在《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報刊上的報導等。總的來說,這些作品的基調幾乎都是認可、讚揚、肯定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建設和抗日戰爭,勾畫出了一個條件刻苦,正義、民主和鬥志昂揚的中共形象。雖然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產黨「赤匪」的排斥心理遠未徹底消除,但是這些著作對中共的正面宣傳架起了一道理解的橋樑。

2. 冷戰背景下正式研究開始起步



從抗戰結束到冷戰時期，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急劇惡化，鑒於在意識形態、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西方學者對某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難免有失偏頗。同時，這一時期，國外學者獲取中共資料十分困難，研究大都是基於理論上的宏觀探討。如查爾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所著的《農民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力量》是一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雖肯定了農民戰爭在抗戰中的重要性，卻狹隘地認為中共的成功得益於日本入侵激起的農民民族主義。^⑤肯尼士·休梅克(Kenneth E. Shewmaker)的《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記述了1927年至1945年間中國國內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過在一些地方上存在著對事實的歪曲，如：他指控斯諾的報道為「紅色宣傳」，抹黑史沫萊特是個「幼稚的左派」^⑥。當然，這一時代也不乏客觀公正的學者。如卡羅爾·卡特(Carolle J. Carter)所著的《延安使命：1944-1947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963 天》詳細地介紹了「迪克西使團」的真實經歷：觀察組成員們紛紛對蔣介石十分失望，而對中共抗戰的努力印象深刻^⑦。比安科(Bianco L.)認為中共成就的偉大之處是共產黨領導人把中國農民團結成了一個革命者^⑧。

這一時期，國外正式對中共研究開始起步。不能否認，國外研究具有嚴謹的態度、豐富的論證材料，對問題的分析較為嚴謹，較為客觀的論述了中共與國民黨兩大陣營在抗戰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但由於受制於研究材料的匱乏和意識形態鬥爭，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對中共的認識不免帶有偏見或停留在比較淺顯的層次，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在其後的研究中必然得到進一步修正與重構。

3. 中美關係正常化，研究深度空前

20世紀80年代至今，西方學者開始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和多元化的視角來審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問題。至此，海外中共形象研究進入黃金期。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著的《鏡裡看中國：從鴉片戰爭到毛澤東時代的駐華外國記者》^⑨、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和弗利森(Oris Friesen)合著的《中國報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新聞口述史》^⑩以及彼得·蘭德(Peter Rand)著《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⑪都批評了麥卡錫主義對抗日戰爭時期來華記者的迫害，讚揚了斯諾、史沫萊特等來華記者是那個時代富有才華，冒險精神的一群新聞記者。彼得·紮羅(Peter Zarrow)在《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的後幾章中展示了中共是如何在矛盾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的漩渦中，適應中國國情最終取得勝利的^⑫。史蒂芬·萊文(Steven Levine)通過關注中國東北地區，提出中國革命是「革命組織的勝利。」萊文通過對內戰這一部分的描述，推翻了早期對共產主義勝利的分析中所表現出的革命浪漫主義^⑬。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戈迪溫(Steven M. Goldstein)和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在其合著中他們用「比較革命」的方法總結了前人的五篇研究，進而駁斥了「中共的勝利是偶然」的看法^⑭。約瑟夫·W·埃謝裡克在《戰爭與革命：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社會》中提到了中共對婦女解放的突出貢獻，給予中共形象公正的評價。^⑮費正清弟子易杜強(John Israel)所著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講述了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種種行為讓一向不問政治的聯大學生產生了抗議，而中共呼籲建立聯合政府和共同抗日的主張則贏得了學生群體的廣泛支持^⑯。

這一時期，隨著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和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國外對於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進入一個成熟期。這一代學者的研究主題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求解中共何以在戰爭中致勝，擴大到了探索與闡釋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研究視角或主題的變化也帶動了研究方法由宏觀敘事向微觀分析的遞進，由此，一個更生動、客觀、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三、總結與啟示

以上學術史梳理表明，國內外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從概念、方法、視角等方面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形象與媒體傳播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對黨



的媒體形象建設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從研究的領域來看,研究的領域相對比較單一,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成果較少。僅僅具備某一學科的知識背景很難對抗戰時期中共形象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正是因為存在跨學科的難度,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目前對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其次,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思辨研究多,實證研究少,僅有的實證調查也多採用人工統計的方式,在研究路徑、研究範式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學界可嘗試運用大資料、統計學的方法,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開展大資料實證調查研究。第三,從研究使用的材料來看,中共方面的材料相對豐富,而「他者」材料明顯不足。研究執政黨的國際形象不能僅限於主體自身的「自語」狀態,也需要使用他者材料從「他者」視角予以觀察,才能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生命力和說服力。

應當指出,目前的研究還不足以還原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被具體構建的過程和這一時期的完整形象,且難以把握中國共產黨形象的變化趨勢。媒體、大眾傳播與國際關係、執政黨形象的構建之間的互動關係,將繼續成為學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和熱點。

注釋

- ① Bianco, L.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the ca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75, 2(3): 313-335.
- ② Benton, G. Esherick, J. W., DeVido, E. A., et al.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Washington, D. C.: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 ③ Carter C. J. *Mission to Yenan: 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 ④ Epstein, I.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 ⑤ French, P.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⑥ Forman H. *Report from Red China. H. Holt and Company*. 1945.
- ⑦ Hartford K, Goldstein S M.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6.
- ⑧ Johnson C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⑨ Levine S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⑩ MacKinnon S R, Friesen O.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Oakland, C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⑪ Rand P.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 ⑫ Srael J. L.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⑬ Snow E. *Red star over China: The classic account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communism*. Atlantic Books, 2017.
- ⑭ Smedley A. *Battle hymn of Chi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44.
- ⑮ Stein G. *Challenge of red China*. London: Pilot Press, 1945.
- ⑯ Shewmaker K E.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 - 1945: 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 ⑰ Zarrow P G, Zarrow P.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2005.
- ⑱ 陳興豔:《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宣傳策研究(1935-1948)》,燕山大學,2018年。
- ⑲ 陳磊:《赴根據地外國記者對中國共產黨抗戰報導研究》,《新聞研究導刊》,2016年第20期,頁97。
- ⑳ 付華豔:《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研究》,湖南大學,2019年。

- ⑳ 胡龍：《試論抗戰時期國際友人對中共形象的建構——以「三 S」為代表》，《新西部（理論版）》，2016 年第 6 期，頁 92-93+89。
- ㉑ 洪富忠：《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建構——以大後方為中心的考察》，《黨的文獻》，2019 年第 6 期，頁 110-116。
- ㉒ 洪富忠：《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形象在大後方的塑造及國共博弈》，《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4 年第 12 期，頁 40-51。
- ㉓ 姜怡文：《太平洋戰爭時期（1943—1945）〈大美晚報〉塑造的共產黨形象》，《中國報業》，2018 年第 16 期，頁 26-28。
- ㉔ 蘭雨彤：《抗戰時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南京大學，2017 年。
- ㉕ 李玲：《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建構》，《長白學刊》，2020 年第 6 期，頁 130-136。
- ㉖ 廖華英，陳勇：《延安時期的語言翻譯特點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文史博覽（理論）》，2016 年第 2 期，頁 18-20。
- ㉗ 李豔：《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形象的塑造及其現實意義》，上海交通大學，2013 年。
- ㉘ 劉興旺，林志彬：《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媒體形象的塑造與認同——以〈新華日報〉為考察物件》，《廣西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0 期，頁 117-120。
- ㉙ 李向洋，王建華：《革命與自我革命——中共在國民參政會上的話語政治研究》，《人文雜誌》，2019（01）：96-103。
- ㉚ 彭波：《從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看中共抗戰形象的建構》，《毛澤東思想研究》2018 年第 6 期，頁 122-127。
- ㉛ 盛開放，李馨，石玉翠：《淺析抗戰前夕外國記者對中共紅軍形象的建構——以斯諾夫婦為中心》，《西部學刊》，2016 年第 6 期，頁 75-77。
- ㉜ 孫景峰，陳倩琳：《政黨形象：概念、意義與建設路徑》，《探索》，2013 年第 3 期，頁 23-27。
- ㉝ 史翠芬：《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研究》，《法制與社會》，2019 年第 16 期，頁 232-233+236。
- ㉞ 石瑾：《「紅太陽」：延安時期黨的形象與黨群關係》，《黨史文苑》，2010 年第 14 期，頁 28-29。
- ㉟ 舒文，嚴曼一：《抗日戰爭時期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客觀反映》，《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6 年第 3 期，頁 48-51。
- ㊱ 王冬梅：《抗戰期間外國記者對抗日根據地的考察及其意義》，《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 年第 11 期，頁 34-41。
- ㊲ 王建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義理論生成的實踐邏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3 期，頁 97-102。
- ㊳ 熊忠輝：《試論延安時期共產黨的形象傳播》，《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1 年第 6 期，頁 100-103。
- ㊴ 熊斌，周勇：《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國恥紀念述論》，《中共黨史研究》，2015 年第 11 期，頁 51-62。
- ㊵ 夏松濤：《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展覽工作的歷史考察》，《蘇區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100-110。
- ㊶ 趙耀宏：《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執政形象探析》，《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0 年第 2 期，頁 89-96。
- ㊷ 張培星：《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對中國共產黨親民形象的傳播》，華中科技大學，2015 年。
- ㊸ 朱瀟瀟，徐宇：《美國主流媒體視域下的中國共產黨形象研究（1930-1937）——以〈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為對象》，《蘇區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62-74。
- ㊹ CHEN Bing. (2021). Explo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A case study from SUNY Alaban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15-28.
- ㊺ HUANG Jiaofeng. (2021). Is Mohism a religion?: Reflection on "Mohism" in Mohist studi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48-57.

(Editors: JIANG Qing & LENG Xueyuan)